

## 由《商賈便覽》看 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倫理

邱 澎 生\*

### 摘 要

隨著十六到十八世紀中國長程貿易的擴展，出現了一批內容涉及交通、住宿、貨幣、度量衡、商品、商稅、應酬書信等各方面資料的「商業書」。對於全盤估計明清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情況，特別是要理解當時商人具備的經商知識、心態、信仰，以及如何評論各類人際關係的價值觀，這些商業書都能提供不少重要的訊息。本文以吳中孚《商賈便覽》為主要史料，探究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倫理問題。

本文研究《商賈便覽》反映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倫理，既將此書內容放入吳中孚在江西省經商開店以及當時中國長程貿易發展的背景做檢視，也以吳中孚強調的「小富由人」概念為軸心，論證吳中孚所欲傳達商業倫理的核心內容。「小富由人」可做為貫串《商賈便覽》全書內容的主軸，對於吳中孚而言，它既可以概括他有關謹慎勤勉有利於商業成功的信念，也能導出「中質者，學工商」這項他視為攸關商業教育訓練的基本理念；因而，「小富由人」可謂是構成了吳中孚《商賈便覽》所欲傳達商業倫理的核心內容。最後，有關《商賈便覽》呈顯的商業倫理究竟可以如何反映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與社會互動關係之變化？本文也希望能提供一些有用的觀察。

**關鍵詞：**吳中孚、《商賈便覽》、商業書、商業倫理、明清

---

2013 年 9 月 16 日收稿，2015 年 7 月 12 日修訂完成，2015 年 7 月 16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 一、前言

隨著十六到十八世紀中國全國市場的擴展，出現了一批內容涉及交通、住宿、貨幣、度量衡、商品、商稅、應酬書信等各方面資料的「商業書」，從而構成反映明清時代商業發達的一項特色。<sup>1</sup> 這些商業書不僅針對一般不分行業的「坐賈」（開設店鋪者）與「行商」（旅途商販者），其他像是從事特定一類商業的典鋪與當舖，以及經營棉布批發與加工的「字號」業者，也都出現了一些用以傳授商業經營相關知識的專門書籍，這些都可統稱為明清中國的商業書。<sup>2</sup> 對於估計明清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概況，特別是想認識當時商業經營所需使用的交通路線、數字計算、書信寫作、貨幣換算、學徒與夥友教育訓練等商業知識，以及由商業經營立場去認識或評論各類人際關係的商業倫理或商業道德問題，這些商業書都能提供不少值得探究的重要訊息。

學界有關明清商業書的研究成果，目前討論大致包括幾類議題：商業水陸交通路線的概況與變動、客商與「車、船、店、腳、牙」等行業者在商業上的交往經驗、算盤技法與商用數學的演變、針對學徒與夥友的商業與工業教育訓練、「日用類書」中收錄的商業知識內容，以及商業書中的「抄稿本」與「刊印本」問題，還有商人道德與商人自覺的主要特徵，涉及面向可謂頗為豐富並且多樣。

以吳中孚《商賈便覽》為主要史料，本文將特別探究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倫理」。商業倫理並非中國傳統文獻所使用的字詞，但為方便呈顯本文分析這些商業書內容的某些重要面向，故而暫予借用，其指涉對象主要是：社會上公開出現的那些有關如何在商業經營過程中提升道德意涵之相關論述。<sup>3</sup>

---

1 陳國棟，〈懋遷化居——商人與商業活動〉，收入劉岱總主編，劉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論：經濟篇——民生的開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頁 272。

2 對現存明清中國各種不同商業書（或稱商書）的比較全面性介紹，主要可見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7）；張海英，〈明清社會變遷與商人意識形態——以明清商書為中心〉，《復旦史學集刊》第 1 輯《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45-165。

3 「商業倫理」這個名詞在目前學界應該仍無通用的界定方式。十八、十九世紀以降的美國社會，出現了許多公開撰寫或是演講有關如何可在商業經營過程當中提升道德意

筆者針對《商賈便覽》這部刊印本商業書，既分析此書對勤勉、節儉、謹慎等道德修養在商業經營如何重要的各種說法，也介紹此書如何以「中質者，學工商」等概念，來概括年輕子弟是否以及何時應該接受商業教育的看法，進而論證這兩方面內容確實可以銜接到吳中孚強調「小富由人」這項核心主張。簡單說，吳中孚透過編輯出版《商賈便覽》、為此書署上自己名字，並以〈自序〉揭示其父親傳給自己的經商理念，強調要在商業經營過程中提升道德意涵，這些涉及財富累積以及人生職業選擇的相關論述，即是本文探究的商業倫理議題。

本文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分析《商賈便覽》如何同時做為文字傳播與口傳心授兩種性質的商業書，第三節介紹吳中孚在江西兩座城市長年經商並於服刑期間撰成《商賈便覽》這一段特殊的人生經歷，第四節分析《商賈便覽》對「小富由人」這一核心觀念的詮釋，以探究吳中孚對個人道德修養如何可以關連到財富累積以及職業選擇等問題，第五節由《商賈便覽》檢視明清商業書如何反映當時中國商業與社會互動關係的一些學界既有看法，第六節為結論。

## 二、有意結合「行商之論」與「坐賈之論」的《商賈便覽》

本文焦點在分梳吳中孚《商賈便覽》的商業倫理。商業倫理屬於商業知識的一環，其內容既廣泛且複雜，為了更好掌握《商賈便覽》的特殊性質，或可先以三項標準來區分明清中國的商業知識：一是「刊印本／抄稿本」的書籍流通形式，二是「行商／坐賈」的不同讀者對象，三是「文字傳播／口傳心授」的傳承途徑。

---

涵的相關論述，有學者將這些現象稱為「商業倫理家」(business ethicists)的出現。若統計 1870 至 1935 年間美國相關報刊與書籍資料庫，可發現諸如 commercial morality、business morality、business ethics、commercial integrity、business integrity 等皆是那些美國「商業倫理家」習慣使用的名詞，雖有某些使用習慣的演變趨勢，但也從未統一；大約自 1920 年代之後，「商業倫理」(business ethics)一詞才逐漸取得主導地位。相關分析可見 Gabriel Abend, *The Moral Background: An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5-10, 95-99.

隨著十六世紀以後明清國內外商貿活動的加速擴展，各類商業知識便以刊印本或抄稿本等不同書籍流通形式，在全國各地製作、傳播或販售。本文討論的《商賈便覽》屬於刊印本，<sup>4</sup>目前可見版本有「六集八卷」與「六集十卷」兩種。「六集八卷」本的書前，收有吳中孚撰於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自序；「六集十卷」本則除收錄自序外，尚列出清道光二年（1822）的書坊出版訊息。<sup>5</sup>

區分明清商業知識內容的第二項標準，是可按主要預設讀者對象差異而將明清商業書大致區分為「行商」與「坐賈」兩大類。行商類商業書主要針對旅途商人而作，除了各類羅列旅行交通路線及沿途風土民情的「程圖」或「路引」等書籍包含了不少這類行商所需商業知識之外，諸如《客商規鑒論》（約 1599）、<sup>6</sup>《士商類要》（約 1626）、<sup>7</sup>《客商一覽醒迷》（約 1635）<sup>8</sup>等，也都是十六世紀以降流傳較廣的行商類商業書。現存明清行商類商業書似乎多以刊印本形式流傳，由書坊製作並在市場上售賣。

---

4 清·吳中孚，《商賈便覽》，「六集八卷」本，書前有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作者自序，影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

5 筆者只見到《商賈便覽》的「六集八卷」本。據學者考察，「六集八卷」與「六集十卷」兩版本的內容基本相同，只是「六集十卷」本將「六集八卷」本的「應酬書信」與「天下水陸路程」兩卷內容分開，從而多添了卷數。同時，「六集十卷」本書前還有「六集八卷」本所無的一條清道光二年（1822）「同文堂」藏版的訊息（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文化的代表作——商賈便覽〉，收入氏著，《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頁 199-201）。但據陳國棟先生告知，「六集十卷」本開列的「同文堂」應為「三益堂」之誤。感謝賜正。

6 明·不著撰人，《客商規鑒論》，收錄於明·三台館主人仰止余象斗編，《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據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余氏雙峰堂刻本影印，後文簡稱《三台萬用正宗》），收於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 3 卷第 2 冊（東京：汲古書院，1999），卷 21「商旅門」，頁 294-348。《三台萬用正宗》原刊於明萬曆二十七年，則收錄書中之《客商規鑒論》應係更早編成。

7 明·程春宇，《士商類要》，書前有明天啟六年（1626）方一桂的敘文，楊正泰點校本，收入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附錄二，頁 229-381。

8 明·李留德，《客商一覽醒迷》，書前有明崇禎八年（1635）〈合刻水陸路程序〉，新校本，收入楊正泰校注，《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 267-329。據瀧野正二郎先生細核崇禎八年本《客商一覽醒迷》告知，此書作者不是楊正泰校注本所寫「李晉德」，而應是「李留德」，特此誌謝。

至於「坐賈」類商業書則主要為經營各類店鋪的商人讀者所編寫，除了《生意世事初階》之外，<sup>9</sup> 至少還包括登錄當舖如何估價各類貨品的「當舖」，<sup>10</sup> 以及有關棉布生產檢驗與買賣行銷等傳授各種棉布經營技藝的《布經》。<sup>11</sup> 比較而論，坐賈類商業書似乎多以抄稿本形式流傳；這些抄稿本可以是原抄本，也可能為重抄本，但基本上都未經書商刻板印行與公開銷售。值得注意的是：吳中孚在編寫《商賈便覽》時，即特別強調要將那些尚未出版的「坐賈之論」相關內容，納入已在市面刊行販售的「行商之論」當中，從而成為一部有意結合行商與坐賈兩大類商業知識的商業書。

區分明清商業知識內容的第三項標準，是「口傳心授」與「文字傳播」的不同傳承途徑。無論是刊印本或抄稿本，都屬於文字傳播的商業知識。至於口傳心授的商業知識，則主要包括個人親身經歷、雇主或師長耳提面命，以及親友私下指點。一般說來，文字傳播的商業知識雖然不少源自口傳心授，但文字書寫畢竟只能概括特定商業事例，難以隨機應變，故而經常不如口傳心授來得親切；但另一方面，文字傳播卻因相對容易流通擴散，這又非口傳心授所能比擬。兩者可謂各有短長。

再進一步看，即使抄稿本與刊印本同屬文字傳播的商業知識，但兩者還是存在重要差異：刊印本流傳範圍雖比抄稿本更大，但抄稿本卻因製作時未曾想要公開給較多素不相識的讀者，則作者、編者或抄者下筆時可能顧忌較少，有時反而記錄了商人對某些敏感事物或特定人際關係的更真實想法，<sup>12</sup> 從

9 清·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階》，書前有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汪氏重抄本序言，現藏南京大學圖書館。感謝范金民與張海英教授協助，令筆者能研讀此書。

10 如《當舖集》（書前封面署有清乾隆二十四年增補鈔本）、《論皮衣粗細毛法》（書前題有清道光二十三年「任城李氏定本，峻山氏重輯」）、《當舖》（清抄本）、《成家寶書》（清抄本）、《定論珍珠價品寶石沆頭》（清抄本），這五種抄本都影印收入《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秘籍》（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印，2001）。

11 目前至少有三種不同《布經》：清·范銅，《布經》，清抄本，影印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第3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82-110；清·不著撰人，《布經要覽》，據清汪裕芳鈔本影印，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2冊，頁581-599；清·不著撰人，《布經》，清抄本，安徽省圖書館藏。這三種《布經》都為抄本。

12 有關這方面問題的討論，參見張海英，〈從明清商書看商業知識的傳授〉，《浙江學刊》2007.2(2007.3): 83-90。

而反映更多原屬口傳心授的商業知識內容。

以下介紹「六集八卷」本《商賈便覽》的基本內容。不妨先看書首目錄如何開列所謂的「六集」與「八卷」：一集包括兩卷，第 1 卷錄入不著撰人的《江湖必讀》原書、蕭廷祚的續增《江湖必讀》，以及吳中孚新增的《工商切要》；第 2 卷包括「經營糧食吉凶日期、神誕風暴日期、各省船名樣式」等三章。二集標做第 3 卷，區分為「各省疆域風俗土產、新增各省土產、異國口外土產、外國方向、各省買賣大馬頭、各省關稅、各省鹽務所出分銷地方、各省茶引」等八章。三集包含 4、5 兩卷，第 4 卷標為「算法摘要」，第 5 卷納入「平秤市譜、辨銀要譜」兩章。四集為第 6 卷，標題是「應酬書信」。五集為第 7 卷，包括「時令佳句、月令別名、族親稱呼」等三章。六集為第 8 卷，標題為「天下路程附土產、馬頭、關稅」。

書首目錄確實提供了《商賈便覽》對商業知識的分類，但若往下翻到各集各卷，則還可見到此書另外一套並行的分類方式：吳中孚有意識地把《商賈便覽》劃分為五部「便覽」：第一集至第二集的第 1 至 3 卷，每卷頁首都刊刻〈商賈便覽〉標題，<sup>13</sup>並都明白開列「鳳岡吳中孚纂輯」。卷 4 首頁不再刊刻〈商賈便覽〉，而改題為〈算法便覽〉；卷 5 改題為〈銀譜便覽〉；卷 6 至卷 7 都題為〈尺牘便覽〉；卷 8 則題為〈路程便覽〉；毫無例外地，所有這些各卷頁首都刊有「鳳岡吳中孚纂輯」。

吳中孚在十八世紀末年「纂輯」《商賈便覽》的事例，其實並非全然前無古人。如做為商人與士人、官員旅行參考的「程圖、路引」，在中國已通行二、三百年。可資商人取用的書信範本，至遲在十七世紀也已出版多部專書。<sup>14</sup>至於《客商規鑒論》這部大約十六世紀末的刊印本商業書，其內容雖然短小，但也已錄入「商賈、銀譜」等商業知識；更不用說《商賈便覽》卷 1 收錄的《江湖必讀》與《續增江湖必讀》，根本即是吳中孚採納既有刊印本商業書的

13 《商賈便覽》名稱實有廣狹二義：廣義泛指全書「六集八卷」所有內容的專書《商賈便覽》，狹義則指此書一集與二集（或是卷 1 至卷 3）專門分部的〈商賈便覽〉。

14 參見鞠清遠，〈清開關前後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 2 輯第 3 冊（臺北：正中書局，1977），頁 205-244。鞠氏該文討論了《商賈便覽》、《江湖尺牘分韻》、《酬世群芳雜編》等三部「商人著作」，《江湖尺牘分韻》刊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已是主要以商人為讀者的書信範文專書。

內容。

既然吳中孚在十八世紀後半已經可在書籍市場找到多種流通的刊本商業書，何以還要另編《商賈便覽》？《商賈便覽》〈自序〉對此問題有些交待：

既有行商之論，豈遂無坐賈之論！爰增數條，兼及土產、書算、字義、辯銀、路程等類，輯成數卷，名為《商賈便覽》……友人力請剞劂，公諸商賈……或於生理之道，不無小補萬一云爾。<sup>15</sup>

對吳中孚而言，《江湖必讀》等商業書固然重要，但其內容主要都係「行商之論」，他覺得這些知識對經營商業仍然不夠，故想另外補入「坐賈之論」；從某個意義看，《工商切要》正是吳中孚補入的「坐賈之論」，他將其內容與《江湖必讀》這類「行商之論」並列，並再納入「土產、書算、字義、辯銀、路程」等商業知識。簡單說，必須同時兼顧「行商之論」與「坐賈之論」，才是吳中孚心中比較完整的「生理之道」。

吳中孚上述話語或可視為他給《商賈便覽》的書籍行銷廣告，希望招徠更多讀者。但我們不妨由文字傳播與口傳心授兩類商業知識的區分，再深入考察此項出版活動。吳中孚讀過《江湖必讀》，這些都是當時透過文字傳播而流通的重要商業知識，但他認為有必要將自己曾受父輩兄長與店內前輩多年來口傳心授的種種重要商業知識整理出來，以豐富既有的文字傳播商業知識。把未出版的「坐賈之論」納入已出版的「行商之論」，並將其裁融為「商賈、算法、銀譜、尺牘、路程」等五部「便覽」；或可這麼說，吳中孚纂輯出版《商賈便覽》的這項出版行動，可視為當時一位中國商人將其之前經由口傳心授習得的「生理之道」，結晶展現為一套更全面的文字傳播商業知識。

不少學者稱許《商賈便覽》的重要性，或指其「達到了明代以來商業書發展的頂點位置」；<sup>16</sup> 或認為這是「明清以來各類商書之集大成者」。<sup>17</sup> 這些評論都有一定道理，但還值得注意：吳中孚在十八世紀末年輯成《商賈便覽》，將經商必備知識劃分為「商賈、算法、銀譜、尺牘、路程」等五種「便覽」，

15 《商賈便覽》〈自序〉，頁2上。

16 (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道豐、孫耀、閻守誠等譯，《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291。

17 陳學文，〈關於明清商書版本與序列的研究〉，《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頁253。

則反映了《商賈便覽》爲了繼續縮小口傳心授與文字傳播不同商業知識之間落差而做的努力，故而帶有一定程度的開創性。

### 三、伴隨十八世紀中國長程貿易成長的吳中孚

過去討論明清商業書，較少強調作者或編者的經商背景，主要原因是作者生平資料不易取得。但《商賈便覽》〈自序〉卻對作者生平留下較多可用線索，故又增添此書在明清商業書中的特殊地位。

吳中孚以一位實際經商的作者身分而編撰《商賈便覽》，就此意義而論，他應是歷史上少數專門撰寫商業事務的商人作家。不僅作者是商人，《商賈便覽》預設主要讀者也是商人，吳中孚要將「生理之道」有關「土產、書算、字義、辯銀、路程」等商業知識「公諸商賈」。這些知識不僅來自吳中孚周遭父兄師友的口傳心授，更具體反映吳中孚一生經商的主要活動區域。做爲一名職業商人，吳中孚主要活動空間是以江西省境內兩座城市爲中心，向外擴及浙江、江蘇鄰省；吳中孚並將他在經商歷程聽聞有關安徽、湖南、湖北、廣東等更大地理範圍的海內外商業訊息，一併裁融納入《商賈便覽》。

與吳中孚經商歷程最密切的地方是兩座江西城市，一是撫州府的崇仁縣，二是廣信府的玉山縣。吳中孚自十二歲起，即於家族開設店鋪的崇仁縣，由父親與兄長指導而學習商業知識，並同時兼讀科舉方面書籍。<sup>18</sup>

過了若干年，少年吳中孚的人生重心轉到玉山縣。吳中孚這段經歷既來自父親有意安排，也肇因吳家在撫州府崇仁縣的商鋪遭逢火災。某年某月間，吳家在崇仁縣商店遭受隔壁火災波及，損失不小，意外發生後，父親派他到玉山縣協助採買商貨。經過認真學習，吳中孚得到更多商業訓練；而在奉派採辦商貨途中，吳中孚也在許多不同城市見識並學習到當時種種不同商業交易習慣：「經過市鎮，其規則頗十知五六焉」。<sup>19</sup>所有這些涉及商品行情與市鎮經商「規則」的商業知識，都讓吳中孚愈來愈能獨當一面。

乾隆三十四年（1769），吳家正式在玉山縣開設一家糧食店，玉山縣也

18 「隨父兄坐店，攻買賣；暇時，兼閱書卷」。（《商賈便覽》〈自序〉，頁 1 上）

19 《商賈便覽》〈自序〉，頁 1 上。

成為吳中孚經商常駐城市。乾隆三十八年，吳中孚父親以七十歲謝世；此後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吳中孚逐漸接掌了吳家在玉山縣的糧食店。只以乾隆三十四至五十三年計算，吳中孚在玉山縣經商即長達二十年。據吳中孚回憶，儘管玉山縣距崇仁縣老家並不算遠，但在經營玉山縣糧食店的二十年當中，他因常到江蘇、浙江出差，少有機會回老家崇仁縣奉養母親，<sup>20</sup> 他日後乃為此悔恨不已。<sup>21</sup>

將場景由個人生涯轉回吳中孚所處時代背景。崇仁縣與玉山縣是吳中孚學習經商的兩個最重要城市，而這兩個城市其實同屬明清江西全省城市化現象發展中的有機環節，需要做些說明。

儘管沒能出現類似蘇州、揚州、南京、杭州、廣州等全國性大城市，但隨著十六至十八世紀長程貿易的發展，江西境內也出現更多繁盛的城鎮，如「瓷都」景德鎮、「茶市」河口鎮、「藥都」樟樹鎮，以及轉口要地的吳城鎮等所謂江西四大鎮。主要藉助這四大鎮的市場中心地效應，眾多江西城鎮與農村市集都逐漸關連到一個日漸繁盛的城鎮體系。<sup>22</sup> 崇仁縣地近樟樹鎮，而玉山縣則緊鄰河口鎮，故而這兩個城市都從屬於十八世紀江西城鎮體系的有機環節。

江西城鎮體系的形成是伴隨當時中國長程貿易發展過程而出現。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長程貿易的基本框架是由三條主要商業幹道所構成：第一條為東西向幹道，是由長江下、中、上游水運所組成；第二條為南北向幹道，是由京杭大運河、贛江配合大庾嶺的水陸聯運線以及珠江流域所組成；第三條

---

20 「走江、浙，繁冗羈絆，不獲朝夕奉養家慈，歲一歸省，為太疎也。」（《商賈便覽》〈自序〉，頁1下）

21 《商賈便覽》〈尺牘便覽〉收錄了〈子外奉母書〉、〈子外奉父書〉、〈孫在外奉答祖書〉等好幾封頗具深情的書信，信內文句如：「自舊拜辭登舟後，光陰迅速，不覺載餘。原擬附字稟安，不料到店數日，即有（某）地之行，今夏方得回來。又無便星，以致遲延迄今，兒心深為惱恨，未知母親同姐弟俱好否？」（《商賈便覽》，卷6，頁3上）

22 參見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收入《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頁177-232。蕭放，〈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的發展及其歷史局限〉，收入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經濟史研究室編，《江西經濟史論叢》第1輯（1987），頁139-175。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3(1998.9): 106-120。

主幹道則為由東北至廣州間的沿海海運線。在這三大支商業幹道及其周遭的網絡內，各地商人組成了不同的商幫團體，共同進行長程貿易；商幫販運貨品，是以稻米、棉布、食鹽等民生必需品為大宗，這個變化改造了過去中國歷史上長程貿易以奢侈品為大宗的商品結構。同時，儘管糧食仍占此時期長程貿易商品最大比重，但棉布卻已取代食鹽成為長程貿易第二大商品，並且還是當時最大宗的手工業產品。<sup>23</sup> 江西位於上述三條幹道內的第二條南北向幹道中間環節，由贛江流域（包含信江、撫河、袁江、修水等支流）以及大庾嶺山路相互配成的水陸聯運線，北往浙江杭州接上大運河，南往廣東南雄則能下接珠江流域。

景德鎮、河口鎮、樟樹鎮與吳城鎮不僅在人口與空間規模、商品流通量、市區設備、市民階層結構等方面於江西省內最見特色，更還對周遭農村地區的基本市集與專業市集產生支配作用；到了清代前期，江西四大鎮與外地市鎮的連繫早已愈加密切，甚至進一步與海外市場產生連繫。<sup>24</sup> 在四大鎮的市場中心性作用下，江西不少城鎮的商業功能也不斷強化。

吳中孚經營糧食店所在地的玉山縣也是一例。玉山縣城西門外的「西關大街」，是由「三里街」與「七里街」兩條長街相銜組成，乾隆《廣信府志》記載玉山城市商業區的景象：「三里街、七里街，縣西門外水陸碼頭」，「行鋪千餘家」，「江、浙、閩、粵商販貨物，由玉山過山，筐夫扛運，最為煩喧」，<sup>25</sup> 江西與福建兩省出產的茶、紙、糧食、煙草等貨品，先匯集至河口鎮，沿信江運至玉山縣，再由玉山縣衆多牙行、店鋪、貨棧、腳行協力運過山路送至浙江常山縣，並自此轉接錢塘江水運；另一路則經衢州、嚴州等府抵達杭州，再接大運河。入境江西的江蘇、浙江等省棉布、絲織等商品，則先聚集玉山縣，再由此處牙行、腳行、貨棧與船行協力，雇船運至河口鎮轉換大船，然後分銷江西全省；或是經大庾嶺山路進入珠江而赴廣州銷往海外。衆多安徽、

23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217-246、247-265。

24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頁 186。

25 清·連柱等纂修，乾隆《廣信府志》，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919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 2〈城池〉、〈鄉都〉。對玉山縣商業發展的討論，參見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頁 118。

浙江、福建以及江西本省商人的聚集，使玉山縣在西關大街等處出現了徽州公所、浙寧公所、天后宮、萬壽宮等商人專屬建築物。與玉山縣緊密連繫的河口鎮，也有茶葉外銷貿易，在道光年間並還出現山西票號的金融機構。<sup>26</sup>

要之，江西在明清時代逐漸成為食糧銷往江南、福建等地的重要省分；<sup>27</sup>加上贛南地區自十六世紀與明末清初有兩波大規模流民移入，不僅使當地土地開發與糧食種植出現較大變化，並還培育藍靛、煙草等經濟作物銷往外省。<sup>28</sup>再者，十六世紀以來，玉山縣即已逐漸成為江西通往江南三條商業交通要道中的重要支線，<sup>29</sup>這些不同時代背景下的變化，似乎反映吳中孚父親總店設於崇仁縣而又開設糧食店於玉山縣這一連串商業決策，都與十八世紀江西商業發展趨勢若合符節。

吳中孚編寫《商賈便覽》時，雖然並未直接描寫玉山縣與崇仁縣的具體環境，但這部商業書記錄的不少商業知識內容，則確實都與他二、三十年經商江西的實際經驗密切關連。在《商賈便覽》「各省買賣大馬頭」章，吳中孚提及江西省四處地方：吳城鎮「雜貨聚賣大」、景德鎮「瓷器好」、樟樹鎮「藥材頗聚」以及「贛州府，茶油出多」。至於江西以外的重要城鎮則也見於此章例舉的內容：漢口鎮為「天下貨物聚賣第一大馬頭」、蘇州「聚賣交易甚大」、北京「買賣頗大」、奉天府「珠玉、人參、各皮貨買賣大」、杭州長安鎮「糧食頗聚」、福建省「永春煙，交易頗大；崇安茶，交易大」，以及寧波「洋海貨多」、福建省近海地區「洋貨多」。<sup>30</sup>十八世紀中國國內的最主要商業城市為何？若用《商賈便覽》文字作答即是：「京、蘇、楚、粵，謀大事繁」，<sup>31</sup>北京、蘇州、漢口、廣州四座城市正是吳中孚這類地方商人心目中的全國主要商業城市，也是最富挑戰性的商業戰場（所謂「謀大事繁」），需要店內頂級

26 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頁 117-119。

27 陳支平，〈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3(1983.4): 116-120。

28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4: 19-40。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黃志繁、廖聲豐，〈清代贛南商品經濟研究：山區經濟典型個案〉（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29 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246-248。

30 《商賈便覽》，卷 3，頁 32 上-33 上。

31 《商賈便覽》，卷 1《工商切要》「學徒任事切要」條，頁 22 上。

幹練的夥計才能應付得宜。

有關當時中國海外貿易，《商賈便覽》的「外國方向」章也有著墨，吳中孚在簡介相關海外貿易地區時，還一併提及清代四大海關的訊息：「凡東、西南居海各外國，如暹羅、琉球、紅毛、安南等十餘國買賣客，飄廣東者多，次則飄福建，再次則飄浙江。俱有定例限飄省分」，<sup>32</sup> 此處不僅提及來華貿易的「紅毛」歐洲商人，還列出清代前期法定開放海外貿易四大海關中的三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sup>33</sup>

吳中孚最常親身遊歷的貿易地點，基本在江西以及浙江、江蘇兩個鄰省；至於《商賈便覽》記錄贛、浙、蘇三省以外地方的海內外商業知識，則主要得自他與其他商人的交往經驗，故他總結自己書中收錄商業訊息其實包含兩類來歷：「或自目睹，或由耳聞」。<sup>34</sup>

另外，《商賈便覽》〈銀譜便覽〉也可反映吳中孚身處時代背景。〈銀譜便覽〉首先標明當時不含銅的純銀幣（「足紋銀」）品質最高：「銀必以足紋為貴，故首重列。一名細絲，又名十足，言無銅者。面上絲極細，而到心底，蜂巢極細極深」。<sup>35</sup> 這是辨別白銀的一項通則，而在〈銀譜便覽〉「各處傾出高低樣式名色」章，則先描述江西各地通用銀兩，並標明吳城鎮銀錠「吳鎮瓜」的品質最佳，故此銀可於江西「通省換錢」；至於江西省城南昌縣的通用銀

32 《商賈便覽》，卷 3，頁 31 上-32 上。文中出現的「飄廣東」在清代其他史料也有寫作「漂廣東」者；兩者有何異同？或可再考。至少在十八世紀之前，「漂廣東」即已成為一群在揚州經商的徽州商人之慣用語，用來形容當時商人由江西往廣東經商途中必須經過贛江許多著名險灘的經商旅途艱辛，可見王振忠，〈漂廣東：徽州茶商的貿易史〉，收入氏著，《千山夕陽：明清社會與文化十題》（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7），頁 103-143。謝謝審查人提醒此研究。

33 此處未提及的另一個清代四大海關是「江海關」。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江、浙、閩、粵四個海關，而至乾隆年間重新申明這四個海關的貿易國家與地區，形成所謂「西洋來市、東洋往市、南洋互市」的關政格局。不少歷史教科書對所謂「一口通商」的理解大有問題：「一口通商」其實是規定西方國家只能到粵海關貿易，而不是江、浙、閩三海關在乾隆年間都被廢止。詳見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 257-289。

34 《商賈便覽》「異國口外土產」章末尾還寫道：「天下之大，人難遍遊，誌豈能悉？故各處物產諸事，不能多知，況予管測，焉識萬一！」（《商賈便覽》，卷 3，頁 31 上）

35 《商賈便覽》，卷 5，頁 15 上。

錠，則「比吳鎮瓜低一色兌換，作九九，次則九八，每錠重有二兩幾、三兩間。樣式，與樟樹、玉山、南豐等處瓜，相仿」。<sup>36</sup>這裏將玉山縣銀錠放在江西其他城鎮的白銀使用脈絡做比較，不只提及吳城鎮、樟樹鎮，也例舉省城南昌縣乃至建昌府南豐縣情形；看來，吳中孚《商賈便覽》〈自序〉寫其「經過市鎮，其規則頗十知五六焉」，確係所言非虛，這些「市鎮規則」也包括各地白銀貨幣的交易習慣。

除了江西省內白銀交易習慣，《商賈便覽》〈銀譜便覽〉還陸續說明「湖廣瓜」、北京通用「官寶、元寶」、山東元寶、廣東與福建「大錠」，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各種白銀，蘇州、徽州、杭州乃至河南各處白銀，甚至寫及「長奇國」所出「洋餅」，以及「交趾、紅毛等國」所出的「花邊」洋錢；最後並有總結：「以上約錄各省土傾之銀。所有巧手，傾出多般低色假偽之銀，此固難以概贅也。但傾色銀巧匠，多屬江南、浙、閩等處之人為最」。<sup>37</sup>由其總結白銀貨幣使用的「市鎮規則」看來，無論是江西與國內其他各省流通的銀錠，以及國外流入銀幣（包括日本長崎「洋餅」以及歐洲人「花邊」洋錢），都已成為吳中孚傳承商業知識的重要內容，這些內容也都反映十八世紀中國國內市場與海外貿易的發展軌跡。

將場景由十八世紀長程貿易與江西城鎮商業的大背景，重新拉回吳中孚的個人遭遇。乾隆五十三年（1788），吳家在玉山縣糧食店因為一場城市火災受到巨大損害；更糟的是，這場火災還嚴重到致使吳中孚「陷成不白」關入縣內監獄。就在吳中孚於獄中等待判決之際，家中傳來惡耗，他的母親竟於此際逝世！獄中的吳中孚不禁「痛哭號天」；就在自嘆「不肖不孝」的哀痛聲中，地方官裁決將吳中孚發配饒州府（古地名「芝陽」）。

饒州府也屬江西省，與廣信府相鄰。也算巧合，位於饒州府境內的發配地原來也是吳中孚以前出差辦貨的「交易熟地」。習慣商業旅行的吳中孚，因為熟悉這個服刑地點，連帶也有更多人脈與資源可以依靠。雖係身屬服刑人

36 《商賈便覽》，卷 5，頁 21 上。感謝陳國棟先生指正「二兩幾、三兩間」的史料標點問題。

37 《商賈便覽》，卷 5，頁 21 上-24 上。吳中孚不僅指出「江南、浙、閩」銀匠的手藝最巧，也在此聲明他在此只能列出各省常用銀兩的名稱及特質，無法顧及那些各省「假偽之銀」，以請其讀者諒察。

犯，但在當時發配服刑的司法制度下，他於白天仍可見到當地朋友，故在精神上能得些許慰藉；但每屆入晚時分，他卻「夜臥，每難安席」，想起尊親教誨而輾轉難眠。後來，吳中孚有了較積極念頭，想將他習得的商業知識「公諸商賈」，以光大並傳承自己得諸父親與師長口傳心授的經商心得。吳中孚希望光大並傳承的經商心得，即包括了《商賈便覽》蘊含的「大富由命，小富由人」以及「中質者，學工商」等商業倫理，下節接續分梳。

#### 四、有助實踐「小富由人」的商業倫理

《商賈便覽》承載的商業倫理，與吳中孚對「小富由人」這句當時民間俗諺的詮釋，兩者密切關連。這兩者間的關連不僅來自吳中孚長年經商的體會，還涉及他在年輕時一段「棄書而為商賈」的生命歷程。

儘管幾乎一生經商，但吳中孚似乎始終記得自己經商前研讀儒學與舉業的那一小段人生經歷。《商賈便覽》〈自序〉開頭的第一句話，吳中孚即做出「余家世業儒」的宣稱，他強調父親年輕時因「甫冠，嘔血」的身體毛病，乃暫時擱置舉業以調養身體，但後來因照顧子女生計所需，故才終於一力從商；但吳中孚父親在經商之餘，內心仍保持著儒生讀書志存仕進的若干願望（「儒素猶未遽改也」）。正因父親對「儒素」的堅持，吳中孚本來也並不因生長商人家庭而斷絕科考志向，他也有一段研讀儒書的童年：「余年七齡，入小學，頗能成誦」；只是，吳中孚從小經常生病，父親乃為其做下「棄書而為商賈」不再攻讀舉業的決定：「先君指曰：兒似能讀，奈居學日少，在病日多」；同時，當此改換志業的人生抉擇之際，吳中孚父親訓勉他一句極緊要的話：「諺有之：大富由命，小富由人，是亦存乎兒之為人耳！」<sup>38</sup>

在匯整「行商／坐賈」以及「文字傳播／口傳心授」等不同來源商業知識而編纂《商賈便覽》的過程裏，吳中孚將父親自幼提示他的「大富由命，小富由人」俗諺，上昇為可以統括《商賈便覽》主要內容的重要綱領：「輯成

---

38 《商賈便覽》〈自序〉，頁 1 上。由吳中孚詮釋他父親與本人「棄書而為商賈」的方式看來，讀儒書參加科考似乎要比經商更需要健康體格與堅強意志。或許當時真有些人認為：身體不夠好的人比較適合做個稱職的商人，而不是拼命苦讀以求通過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

數卷，名為《商賈便覽》，以訓後裔。庶幾小富由人，或可加之以教，不負先嚴之訓誨也」。吳中孚將這本蘊含「小富由人」思想綱領的專書，獻給了他的商人讀者：「輯成，友人力請剞劂，公諸商賈」，他寄望於此書刊印後，「或於生理之道，不無小補萬一云爾」。<sup>39</sup>

對吳中孚而言，「生理之道」係屬「小富由人」範疇；而由「儒素」通過科考進而博取官場升遷，或是本來即出生於富貴之家，這些大概都屬於所謂「大富由命」的範疇。由《商賈便覽》〈自序〉提及吳中孚與其父親同樣都經歷了原本攻讀舉業後乃從事商業的敘事看來，「大富」與「小富」這組對比性詞句對當時吳中孚這類職業商人而言，應是對其個人生命歷程饒富意義的關鍵概念，而非只是信筆拈來的陳腔濫調。

「大富由命」與「小富由人」這組相互對舉的俗諺，經過吳家父子的體會與詮釋，已由口傳心授的商業知識，變成接近商人吳家的「家訓」性質，更上昇為吳中孚有意建構文字傳播商業知識的關鍵概念。當吳中孚宣稱「庶幾小富由人，或可加之以教」，正是要將《商賈便覽》所欲「公諸商賈」的「生理之道」，定位為對於「小富由人」概念的具體實踐之路。對吳中孚而言，《商賈便覽》全書載錄與論說的「生理之道」，即是那些可幫助商人追求「小富」境界的商業知識與商業倫理；反過來說，《商賈便覽》所無法提供助益者，則是有關追求「大富」那類諸如博取科舉仕途的東西。吳中孚相信：人之所以能夠「大富」，其實靠的主要是「命」，人力在此有時而窮。但若要追求「小富」，則還是可依靠自身的努力。

然則，能夠落實「小富由人」的「生理之道」到底包含哪些內容？除了對「土產、書算、字義、辯銀、路程」等商業知識的學習與掌握之外，《商賈便覽》還傳達了有助於實踐「小富由人」的商業倫理思想，其內容至少包括兩大項：一是在各個經商環節上，論述所有商人都該隨時謹慎並且勤勉不懈。二是要做一位稱職的商人，必得量才適性，並要在適當年齡及時學習各種「生理之道」。這兩項商業倫理的主要內容，比較密集地反映在《商賈便覽》卷1收錄由吳中孚新增的《工商切要》大約31條內容。

---

39 《商賈便覽》〈自序〉，頁2上。

### (一)「君子俱宜精察而提防之」：有關謹慎或勤勉的商業倫理

先談吳中孚對謹慎或勤勉的論述。這項商業倫理思想乍看之下顯得有些空泛，但在 31 條《工商切要》中則呈顯的其實頗為具體，吳中孚主要著眼三項事務：一是老板自己要時刻留意財務收支與人事組織。二是教導店內夥計與學徒，既要小心預防各類風險，也要不斷認真學習。三是經商合股要常存寬恕，並且避免涉入難以解決的訴訟。

吳中孚論述謹慎或勤勉的第一項事務，是老板要親自考核店內財務收支與人事組織。吳中孚在《工商切要》第 27 條解釋道：「店鋪生意，無論大小，俱宜度量穩當處而為之，方可保本圖利。即生意不能通達，亦不致大折本源。」<sup>40</sup>「保本圖利」涉及經營與會計知識，老板無法事必躬親，故需聘用專門人才，即使需要重金禮聘負責經營與管賬的「店官」，也不應省錢惜費而錯失人才。《工商切要》第 29 條建議店主選用「老誠忠厚、才德兼備者」做「店官」；雖然這類店官常得高薪聘請，但為讓店鋪「保本圖利」，此舉依然值得。但吳中孚強調：即使高薪聘請店官，老板自己對店內「所有賬簿」也還是應「宜自同理查核，方無錯誤」；惟有老板時刻謹慎並且勤快查賬，才能洞悉並防阻店員的任何「作奸舞弊之心」。<sup>41</sup>生意難免風險，高薪也有流弊，《工商切要》第 28 條載明：店官為隱瞞某筆「壞生意」致使自己業績「折本」的會計紀錄，可能會串通記帳人員製作假帳，故老板必得謹慎預防，所謂「君子俱宜精察而提防之」。<sup>42</sup>

有關「保本圖利」的各項事宜，不是只靠老板個人時刻謹慎而已，還要重視店內的組織結構，要認真對待店規章程以及職員分工。好的店規章程要能對四類功能不同的店鋪職員進行組織與考核：一為「管總」，其職責為「統事庫房」；二為「內、外店官」，負責「買賣水客、訪市辦貨、接對客友、查收各賬」等業務；三為「尋船」，處理「起貨下貨、管棧出入、收拾貨物」等事；四為「雜務」，職司「粗工、炊爨」等事。<sup>43</sup>在十八世紀江西與其他省分，

40 《商賈便覽》，卷 2，頁 4 下。

41 《商賈便覽》，卷 2，頁 5 上。

42 原文有云：店官「為壞生意折本，恐被主人責革，作弊於簿上，浮載出息，以欺主人，圖再信用」。（《商賈便覽》，卷 2，頁 5 上）

43 吳中孚強調開店要「定章程而不易」，並要「因人授事，量能論俸」。（《商賈便覽》，

一處商鋪若要同時具備這四類職司不同功能的職員，資本也得有一定規模；但即使吳中孚只在玉山縣與崇仁縣兩處不算全國知名城鎮裏經商，區分「管總、內外店官、尋船、雜務」四類人員的商鋪組織，看來也已是吳中孚具體實踐過的店規章程與職員分工。

第二項需要謹慎勤勉的事務，是教導店內夥計與學徒都要謹慎勤勉，其細目有三：第一，無論出外採買或在店鋪幫辦，夥計都要謹慎保養身體，並時刻留意行旅安全。二，夥計需留神僱夫、船家的設計坑害，並對其他商人賒欠不還也要特別謹慎預防。三，夥計必得勤於寫信，以通報商品行情起落；學徒應尊敬師友，每日勤奮學習各項生理之道。

夥計奉派出外採買或在店鋪幫辦，都要遠離酒色財氣以謹慎保養身體。《工商切要》第 14 條對此詳細論道：飲酒雖有助交際，但過量則「必至亂事」，何以故？「行舡防風，夜舡防盜，居棧防火，買賣防錯誤，應對防失禮」，無論是在外搭船注意風暴危害、夜晚留宿船艙需要留神盜竊、貨物存貯倉庫必得小心火燭、買賣經手得要擔心出錯，而與人交際也恐怕失禮，這些場合都要夥計謹慎小心。同時，外出夥計身負採買重任，身體便當自行保重，不僅「酒色賭博宜戒」，「即與人罵毆，亦當節性養氣」，而飲食遇到「冷熱之物」也得「忌口」。天氣不好時，「酷暑嚴寒，須知略避」；若非得及時到達某地，「或不得已而冒暑衝寒」，便要小心添減衣物。吳中孚總結道：「勤可治生，儉可惜福」，「凡有所好，必有所忌，自古至今，樂極生憂」，「安於中和，保身延壽，第一方也」。<sup>44</sup> 此處不僅宣揚勤勉治生、節儉惜福的理念，也勸人謹慎保養，不要過度飲酒、貪色、賭博，莫隨意與人罵毆，才能保身延壽。

商業旅行免不了坐船，行船安全也是吳中孚諄諄告誡事項，他甚至不憚其詳開列船上如何安全並且乾淨地大、小便的各種辦法。《工商切要》第 7 條載及：「出外經營，難免坐舡。走水買賣，居舟尤多。稍不慎重，命喪傾刻，寸步須當留心」，接著即建議夥計與學徒如何大、小便各項細節：

在淺小之河，看定舡有十分穩妥可扳之處，方可大、小便。若大河中，宜用便桶出恭，便壺小解；隨即蓋密，放入自坐艙底，無令穢氣薰人。俟舡

---

卷 1，頁 22-23）

44 《商賈便覽》，卷 1，頁 21 下。

住之時，傾下河去，打水洗淨。<sup>45</sup>

這裏區分了「淺小之河」與「大河」等不同情境的上廁所方式：小河相對安全，扶定之後即可隨船隻航行途中解決問題。但大河行船則風波不測與船底變化等因素較大，行船途中更加危險，故而不宜直接在開航船邊大、小便，應改在船艙內使用便桶便壺。

教導夥計與學徒謹慎勤勉的第二項子目，是必須留神僱夫、船家設計坑害或是洪水暴風為災，以及其他商人賒欠財貨不還。在商業旅途上，挑夫竊走財貨，以及船戶盜賣錢財，所在多有，如何謹慎預防？《工商切要》做了頗多叮囑。吳中孚指出年輕夥計僱請腳夫挑貨的常見弊害：「少年性急，疎失者多，或因忙中亂僱，或貪腳錢便宜，不肯小心」；他建議委請船夫及近埠頭店家代僱挑夫，如此則「腳錢雖貴，而有經手，可保無失」。僱船亦然，「凡僱舡載貨，宜投老誠舡行」，特別是船上水手「人多壯健」者，雖然船費較高，但搭載此種船隻，「不但貨不踈折，即遇風狂水大，亦可藉保無虞」。<sup>46</sup>即使船夫未曾存心不良，但晚上船靠河灣停歇，也要時刻驚醒，提防「洪水忽漲」或是「河水高衝」，「以防失誤」。<sup>47</sup>

至於買賣賒帳，吳中孚指出這項商場常見陋習其實難以避免：「開鋪者，各鄉市鎮，主顧必多，難免掛欠」，但他提醒商人對此仍宜特別謹慎，總得儘量少賒帳，萬不得已，也要「擇人而授，寧少莫多」。同時，他也要商人反求諸己、以信義服人：「貨要賣真，價作公平，以義取利，主顧信服」，如能此道，則賒欠者「非貧難償，必不負也。」<sup>48</sup>

教導夥計與學徒謹慎勤勉的第三項子目，是夥計必得勤於寫信，以便通報商品行情起落；而給學徒訓誡，則是尊敬師友，待人謙恭，並且每日勤奮學習。《工商切要》〈書信勤通，趨避兩得〉條寫道：夥計與商人在外若能勤

45 《商賈便覽》，卷 1，頁 18 上-18 下。吳中孚何以要做出「無令穢氣薰人」的提醒？究係為了商人自己旅途舒適？抑或擔心船中其他乘客見怪而有失商人自身「體面」？恐怕不好執定一端，大概兩者兼有。

46 《商賈便覽》，卷 1，頁 19 上-20 下。

47 吳中孚言道：「每見黑夜突泛洪水，急衝舡動，以致纜斷錨走，人貨俱作魚蝦矣！此雖舡夫之事，客人亦要留心」。（《商賈便覽》，卷 1，頁 20 下）

48 《商賈便覽》，卷 1，頁 24 下。

於書信，則不僅本店經理與行主可以常握「各處貨物行情，時知裁辦」，同時，寫信者本人也可彼此相互慰問。有關各地商業訊息的「機風」變化快速，必須儘快寫信通報店家，才能趨避得時：「勤謀生理者，不惜筆墨、吝省小費。每逢緊要，即專僱飛報，或給酒錢，附便快交。則知機風，早晚可得趨避，而有益矣。」<sup>49</sup>

給學徒的訓誡則包括尊敬師友、待人謙恭，並且每日勤奮學習。吳中孚寫道：「子弟投師學貿易，先分尊卑稱呼。行鋪正主為師，並有總管及正店官帶徒者，此皆專管專教之師，本稱老師」，這是學徒正式的老師；不只如此，吳中孚接著教導：「同事中，有年長過我二十以上者，均當以老師、老伯稱之。年長十歲以上者，以老叔稱之。年長數歲，及先後學徒年長者，皆以老兄稱之。惟後來學徒小於我者，方可以老弟呼之」；要之，「一切來往客友，總以尊長貴重稱之；無緊急事，不可高聲呼尊長之名。常時，須平聲和容，稱呼應答，乃為善也！」<sup>50</sup> 這些話語的內容與口氣，都像極老板當面教導店內學徒的訓勉之詞，其主旨都在教人時刻謹謙恭。

不只稱呼與說話要教導，舉止與態度也得學習。學徒新入店內，「當侍立眾店官之側，或立久，方許坐」，並要「從低末之處，眼看前班夥徒」，訓誡學徒要謹慎對待「店官」、前班櫃台上的夥計以及入門較久的學徒。學徒每天都要照料店內各項雜務：清早起床，得掃地、開店門、抹洗櫃台桌椅、整理架上擺設貨樣、「燃神位香燈」；「行主及師長臥起」，還得伺候「梳洗、茶、煙」；然後到庫房幫忙清點商家登錄進出錢貨的草帳，一路忙到晚餐之前，便得關鋪門、「點神位香燈」。吃畢晚餐，各項工作做完，得「候過師長」，但還不可「即進房安睡」，「須到閒靜處，或自一人，或邀夥徒，同習算盤，或學字信，必要做過半個時久，方許就寢」。每日早晚忙碌的學徒生活，總要「須晏眠起早，莫懶惰好吃」；等到「天雨之日」，因為店內生意較少，「眾夥閒坐

---

49 此段文字所謂的「趨」，可謂是預先進貨居寄以賺得好價錢，而「避」則常是出清存貨以減少未來損失；至於這些預測商品價格起落的「機風」之所以可能，則多繫於奉派出外夥計能夠勤通書信。引見《商賈便覽》，卷2，頁4上-4下。此段內容係為錯簡，原應放在目錄標示卷1收錄的《工商切要》裏，這也多少反映此一版本《商賈便覽》有些校讐未精。

50 《商賈便覽》，卷1，頁22上。

時，方可請教師長：看銀水，學算盤，講書信，及生意各事」，吳中孚爲學徒生活做下總結：「其由生而熟，自拙而精，皆在留心觀聽，思慕之勤，神到自明矣！」<sup>51</sup> 要之，吳中孚爲學徒設定了一個極忙碌的模範情境，只有謹慎小心與勤勉不懈，始克有濟。或許，能通過此種考驗的學徒，未來也極可能在商場上頭角崢嶸。

吳中孚論述謹慎或勤勉的第三項事務，是經商合夥總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寬恕，要在財務問題上避免「公財」與「私財」劃分不夠清楚的嫌疑；同時，也莫要涉入難以解決的訴訟。

《商賈便覽》收錄《工商切要》第 24 條指出：商人合夥經營生意，勢所難免，故要小心認清楚與自己合作商人的各種不同性情，從而寬容對待：「各揣己之性，以度人之性。若己之性善，不妨容衆之不善」。寬恕待人的同時，還要謹慎處理自身「私財」與合夥「公財」的分際，若一味地「營私得志」，則於「公事不覺忽略」，等到失誤事發，不僅「夥伴嫌疑啓訟」而致同事相互爭吵，自己人格信用也受減損，甚至還可能遭到「天理報復」以致「平日所得之私財，皆消諸烏有」，何苦來哉？

吳中孚這裏透露了當時「合夥」經商的某種商業習慣：即使店內夥計，也可在每年平均分取利潤的「公財」之外，自行利用「均本」之後所剩餘銀，「帶做己分小夥」；此外，還有一類「幫夥」，則是「己下有銀，亦做己下小夥」。但吳中孚還是委婉批評了這種商業習慣：「如此所爲，即屬公正之人，日久，不無嫌疑；況其不公者？似難免是非爭論矣！」吳中孚建議：「莫若將銀統歸衆做，或補公息，或照本分利，以免一身兩心，豈不盡善！」如果實在「私財」已遠遠超過「公財」，則不妨考慮拆夥另起爐灶：「至有大本錢，付衆難以概理，或抽身自爲，或另夥別圖，庶不致一身兼二，以取嫌疑之漸耳」。<sup>52</sup> 看來，時刻並且更好地預防自己在財務合股方面出現難以劃清「公財」與「私財」的「嫌疑」，也是吳中孚傳達與謹慎相關連的商業倫理。

「小忿不忍，以致興訟」，亦是商人應該謹慎小心的重要事項。《工商切要》最後一條〈好訟禍端當察〉，內容長約 3 頁，不過，吳中孚於文末註明此條

51 以上引見《商賈便覽》，卷 1，頁 22-23。

52 《商賈便覽》，卷 2，頁 3 下-4 上。

其實是他轉引《願休集》他人著書的篇章。此篇文字勸告不要輕易訴訟，文中既分析「訟棍結連衙役，兩相表裏」的現實，又說明何以「既告狀，則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的道理。同時，還詳論「或稱門上，或號幕賓」種種人物主動幫訴訟當事人出謀劃策的手段，碰到這些號稱地方官門丁或是幕友的人物，最後總是自己倒楣。《願休集》的作者在此指出：對於各類訟棍，固然「歷來各憲查拏森嚴」，但總是難以禁絕，自己總要加意小心：「訟弊多端，智者難防不測。終訟，即有財能通神，不無天理報覆。寧省訟費，以資親鄰。專心正業，共樂昇平。豈不美哉！」吳中孚長篇抄錄此文，應可看出他對此篇內容的認可。預防訴訟可能招致的種種危險，也是《商賈便覽》「公諸商賈」傳達有關謹慎的商業倫理。<sup>53</sup>

## （二）「中質者，學工商」

《商賈便覽》收錄《工商切要》討論的第二大類商業倫理，是勸說家長早些評估家內子弟的才能與性情，選擇其中合適經商者，讓他們及時學習「生理之道」，以便日後成為一位稱職的商人。

招募並訓練夥計與學徒，是經營商鋪「坐賈之論」的不可或缺內容。吳中孚除了對學徒訓練開列了前述頗詳細的主張，還提出他對人性的觀察，區分了人在才能與性情方面有著「賢愚不等」的差異，進而建議父母及早觀察並判定子弟是否合適經商。這些看法主要見諸《工商切要》最前面四條內容，四條標題依序為：〈習慣成性，壞在幼時〉、〈諒質授業〉、〈乘時習藝〉、〈學藝業，貴擇師伴〉。<sup>54</sup>

53 「小忿不忍，以致興訟」畢竟是吳中孚勸告商人的一種理想，在商業經營的真實世界裏，各類不同商業訴訟還是經常出現在明清許多商業發達城鎮，相關事例與研究可見范金民，《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訴訟》（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臺大文史哲學報》43(1995.12): 37-92；邱澎生，〈國法與幫規：清代前期重慶城的船運糾紛解決機制〉，收入邱澎生、陳熙遠合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275-344；陳亞平，《尋求規則與秩序：18-19 世紀重慶商人組織的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戴史翠（Maura Dykstra），〈帝國、知縣、商人以及聯繫彼此的紐帶：清代重慶的商業訴訟〉，收入王希主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重慶：重慶史研究論文選編》（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頁 166-180。

54 《商賈便覽》，卷 1，頁 16-17。

基本上，吳中孚認同人性本善（「初性本善」），但隨著嬰兒漸能言語走動，「習慣」便愈益關鍵，其中尤以「賢父、嚴師」對子弟未來品行影響最大。子弟將屆成年，父母便該「察其質，授之業」，孩子「設或不能讀書」，便可使其「習商賈」成為商人。吳中孚強調：即使選擇做商人，也不能忘記教導孩子「仁、義、禮、智、信」的道理。孩子「習商賈」之後何以仍要學習仁義禮智信？吳中孚是以君子要求「生財有道」為理據：

苟不教焉，而又縱之，其性必改，其心則不可問矣！雖能生財，斷無從道而來，君子不足尚也。<sup>55</sup>

在吳中孚心中，光會賺大錢仍然不夠，生財同時還要能不違背「仁義禮智信」，在商業經營中實踐「從道而來」的種種賺錢方法，這才是君子認可稱揚的「生財有道」。

在學習「生財有道」的商業知識與商業倫理之前，最重要的仍是孩子究竟是要「讀書」、「習商賈」或是從事其他職業的人生抉擇問題。在吳中孚看來，幫孩子選擇合適的職業，也是父母親的重要職責，他對此提供建言：「父母自幼留心察識，上質者，習儒業。中質者，學工商。下愚者，務農業」。從行文語氣看來，吳中孚似乎並不區分「士、農、工、商」傳統「四民」彼此之間高下有別，他只強調：「士農工商，須各執一業」，「因人而授，貴在於專。俗云：行行出狀元，只要有志氣」。雖然人有「賢愚不等」的「質性」差異，但只要專心學習並且「有志氣」，就能「行行出狀元」。在吳中孚此段論述裏，子弟專攻「儒業」的價值似乎並不特別高於從事工商職業者。<sup>56</sup>

然而，即使父母考察子弟性情屬「中質者」而決定讓孩子「學工商」，也還得講究何時開始學習的年齡問題。吳中孚認為學習工商「正業」的最好年紀，應是介於「十一、二歲至十八、九歲」之間；因為此段年紀的兒童與青少年，「性未定，年未長，世事漸知，師長可以隨事教訓，易為節制也」。換言之，此階段的孩子不僅有基本學習能力，而且可塑性較高，老師前輩才能予以好好訓練；年紀太小或太大都不合宜，<sup>57</sup>此即《工商切要》第三條〈乘

55 《商賈便覽》，卷 1，頁 16 上。

56 《商賈便覽》，卷 1，頁 16 上。

57 「凡子弟十歲以前，不可為工賈之徒，以其弱小，世故未知，授事難執，教導難明。」

時習藝》基本內容。於〈學藝業，貴擇師伴〉條中，吳中孚再次強調：教導家中「中質者」的子弟學習商業知識，是為父兄者的重要責任，讓家中子弟有機會跟隨「賢師、良友」學習，才能真在「藝業」上精進，從而終生受益。

要之，吳中孚提出「中質者，學工商」的概念，可視為他對傳統「四民」觀念與「行行出狀元」俗諺的進一步發揮。按吳中孚的說法，則社會上所有年輕子弟都可區分「上質、中質、下愚」三個類型，同時再添入「中質」者適合「學工商」的命題，吳中孚可謂是為商人這類職業找到一種更富積極意義的社會合理性。<sup>58</sup>

可以這麼說，「讀書」參加科考是否必能博取「大富」？吳中孚對此頗為懷疑，故他只能說「大富由命」；因為科考成功與仕途順遂，恐怕與出生富貴之家一樣，大概都無必然之理；但只要跟對老師、用對方法，時刻小心謹慎，「店鋪生意，無論大小，俱宜度量穩當處而為之」，並且運用「仁義禮智信」的修身功夫，即可達到「生財有道」的「小富」境界。要之，這條「中質者，學工商」的人生道路一樣能幫助個人累積財富，這可謂是貫串《商賈便覽》商業倫理思想的「小富由人」真義。

正因深信「小富由人」，吳中孚才可堂而皇之地勸告天下父母協助自己小孩做出合適的生涯選擇：「中質者，學工商」，故可不必再強求孩子硬往科舉之路擠。從某個意義說，「小富由人」正與「中質者，學工商」相表裏，吳中孚《商賈便覽》所欲傳達的商業倫理，其實反映了這位成長於江西省兩座城市的職業商人，原來也有著一種不卑不亢而又充滿自信的日常生活世界。

### （三）「大富由命，小富由人」：勤儉的商業倫理

在整理《商賈便覽》有關謹慎或勤勉以及「中質者，學工商」兩大類商業倫理思想之後，可再重新回到吳中孚徵引「大富由命，小富由人」這句民

---

二十歲以後者，亦屬難學，以其長大，性格已定，師長叱責不便，即嚴督亦難隨事改悔也。」（《商賈便覽》，卷1，頁16上-16下）

58 或可引申吳中孚區分三類型青年人的意旨：以不同學習品質者在社會所占人數比例而論，「中質者」可能要占絕大多數，而「上質」與「下愚」畢竟少數；若按吳中孚有關「質性」與「貴在於專」的提法，則社會上大多數人豈不都該選擇「學工商」嗎？姑且不論吳中孚是否真有此意，至少，他很明確建議父母：為孩子選擇職業時，應該依照孩子「質性」做評量，不要排除包含「工商」在內的職業。

間俗諺。「大富」與「小富」這組二元對立式概念，似乎並不早於宋元時代；<sup>59</sup> 至於吳中孚賦予「小富由人」此語某種商業倫理的意涵，既係承繼自他父親的剴切訓勉，也同時來自他本人豐富的經商體驗。

「大富由命，小富由人」的商業倫理，並不只是吳中孚的個人信念，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書籍市場中不少商業書已多少反映了類似信念。<sup>60</sup> 《士商類要》收錄的《買賣機關》，即載有〈富從勤得，貧係懶招〉一條，<sup>61</sup> 其標題與內容後來都納入《商賈便覽》收錄蕭廷祚續增的《江湖必讀》第 5 條。《買賣機關》作者對此條解釋道：「若謂貧富各有天定，豈有坐可致富、懶可保貧哉！」此位作者也不相信貧人與富人係由上天註定，他深信的是「富從勤得，貧係懶招」這一基本道理：「吾衣食豐足，未必不由勤儉而得；觀彼懶惰之人，游手好閒，不務生理，既無天墜之食，又無地產之衣，若不饑寒，吾不信矣。」<sup>62</sup> 兩相比較，《買賣機關》〈富從勤得，貧係懶招〉主要意旨實與吳中孚的「大富由命，小富由人」主張基本相同；只是，《買賣機關》說的是「彼大富，固有自來」，並未明顯將「命」與「大富」連繫起來，更沒有帶出與「大富」相對舉的「小富」概念，故與《商賈便覽》有些細節上的差異。

要之，《買賣機關》作者還是質疑了「貧富各有天定」的既有看法，並明確肯認了「勤儉」能使「衣食豐足」，而「懶惰之人，游手好閒，不務生理」則多半難逃「饑寒」結局之基本立場；因此，與《商賈便覽》援用「大富由命，小富由人」俗諺做比較，兩者基本意旨相同，確有異曲同工之妙；相對而論，吳中孚只是將其中意義發揮的更加清晰與完整而已。從這個意義看，吳中孚並非特例，我們毋寧可將《商賈便覽》承載的「小富由人」商業倫理，視為是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一群中國職業商人對於財富可藉自身勤勉、節儉與謹慎而成功累積這種共同信念的發展演化。

59 檢索「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2007.12.12 上網檢索)，「大富」一詞出現較早，但「小富」詞條則不僅數量更少而且出現年代更晚。至於以「大富」與「小富」相對舉，更是晚至元代的南戲劇本《小孫屠》才見到：「小富由命，大富由天。」（《永樂大典戲文》〈小孫屠〉）

60 參見魏金玉，〈介紹一商業書抄本〉，《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1(1991.2): 51。

61 明·程春宇，《士商類要》，頁 299。

62 《商賈便覽》，卷 1，頁 14 下。

## 五、由《商賈便覽》看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與社會

如何整體評價包含《商賈便覽》在內不少傳統中國商業書所反映明清商業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有學者對此抱持負面評價，如寺田隆信所說：「商業書雖然提出了對經商能力與品德的要求，認為這是經商致富之法，也是創建商人社會的支柱，但未能從社會結構去看商業的繁榮，也未注意到經商獲利的意義所在」；在商業書作者身上，「似乎並不存在營利與仁義之間的矛盾的苦惱，也看不到企圖建立超越倫理觀的經商之道和積極地為商人在買賣中獲得利益提供理論的動機，這就必然使他們的著作在對現實生活中的商人提出要求時，局限於單純的品德和個人的機智方面」。寺田隆信甚至將山西商人的經商實踐結合他讀到的明清商業書內容，進而論道：「山西商人的商業觀和商業書的說教，可以說並不反映包括隨著商業的發展而對產生和支持這種商業道德本身社會體制的批判，也不包含朝著既定的方向勇往直前迫使士大夫階級承認商人階級獨立存在的價值」；因而「其意義是非常局限的」。<sup>63</sup>

但有學者不像寺田隆信那般負面評論明清中國商業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如魏金玉針對《商賈便覽》的「大富由命，小富由人」觀念，即強調明清其他商業書也有類似吳中孚這樣的看法，這些看法呈顯了「反對天命論的思

---

63 (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道豐、孫耀、閻守誠等譯，《山西商人研究》，頁 298。

寺田隆信有關明清商業書「似乎並不存在營利與仁義之間的矛盾的苦惱」這類看法，明顯來自韋伯(Max Weber)《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相關論點。如學者所論，所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提法，固然可謂是以「簡潔扼要的方式」將西方資本主義起源及其性質「這段最曲折的歷史過程講的如此生動而精彩」(顧忠華，《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 177)，但應考慮到：若回到 1905 年韋伯此書論證基本內容初次發表時，其在歐洲學界引來的反應，不僅「不是佳評如潮」，反而是不同意見的「喧聲連連」(康樂，〈說明〉，收入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7，頁 1)。同時，韋伯的「新教倫理」論述固然精彩，但卻難免帶有「以近代人的自我作為中心」來對歷史進行「尋根式」探究的特殊歷史觀，我們不宜忽略「韋伯式理論的時空性和問題性」，參見錢新祖，〈近代人談近代化的時空性〉，收入氏著，《思想與文化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頁 13。

想」，可見這些商人作者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並「不是聽天由命的」。<sup>64</sup>

余英時的評價更為全面，他由晚明以來長期「士商相雜」現象來論證當時中國商人意識形態（或是所謂「商人精神」）的發展背景及其歷史意義：「在明清士大夫的作品中，商人的意識形態已浮現出來了，商人自己的話被大量地引用在這些文字之中」；同時，由於「士商相雜」，「有些士大夫（特別如汪道昆）根本已改從商人的觀點來看世界了」。余英時認為：「明、清的商業書，雖是為實用的目的而編寫」，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商人的意識形態」；我們尤應重視「商人的社會自覺」，「他們已自覺『賈道』即是『道』的一部分」，而當時一些「幼有大志」的商人更還「具有超越性的『創業』動機」。余氏認為這些商人的意識形態其實可具體反映當時中國儒、釋、道三教對於「上層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綜合作用，而且，其中還可見到「商人究竟是怎樣巧妙地運用中國傳統中的某些文化因素來發展『賈道』」。余英時提醒中國思想史研究者不要「有意或無意地把西方的模式硬套在中國史的格局上面」，並主張：對於明清商業書反映的思想內容，「我們絕不能因為他們依附了某些舊形式而忽視其中所含蘊的新創造」。<sup>65</sup>

吳中孚透過編寫《商賈便覽》而對「大富由命，小富由人」、「上質者，習儒業；中質者，學工商」等概念進行詮釋；像吳中孚這樣主要在江西長期經商的地方性職業商人，確實是在為十八世紀中國商業倫理的發展提出某種具有體系性的論述。從而也為余英時有關明清商人「怎樣巧妙地運用中國傳統中的某些文化因素來發展『賈道』」做了某種現身說法。<sup>66</sup>

64 魏金玉，〈介紹一商業書抄本〉，頁 51。

65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 162-163。余氏這裏有關「具有超越性的『創業』動機」提法，涉及韋伯學術有關「宗教倫理」與「經濟發展」之間「選擇性親和」關係的討論，而學者有關中國傳統與現代「儒家倫理」或「經濟倫理」的爭辯也有眾多相關研究，可見顧忠華，〈儒家文化與經濟倫理〉，收入劉小楓、林立偉編，《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 45-66。

66 有學者強調：「宗教倫理必須處於具體的脈絡之中，方能確定其特殊的影響」，如儒家倫理強調的「勤儉」美德與「成就動機」在傳統社會是否真曾落實到有利資本累積的經濟活動中？研究者應該對此層面特別留意考察，見黃進興，〈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迷思或事實？〉，收入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出

至於商人意識形態對社會整體影響如何？余英時評估：「概括言之，十六世紀以後商人確已逐步發展了一個相對『自足』的世界。這個世界立足於市場經濟，但不斷向其他領域擴張，包括社會、政治與文化；而且在擴張的過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改變了其他領域的面貌。改變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會與文化。」<sup>67</sup> 這項觀察頗為全面，明清中國長期「士商相雜」現象，確實伴隨著十六世紀以降中國長程貿易與都市化發展的大背景出現；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士商相雜」的結果，既有士人價值觀改變商人的面向，但又未嘗沒有商人價值觀反過來改變士人的影響？<sup>68</sup>

陸冬遠（Richard John Lufrano）分析清乾隆年間一部約與《商賈便覽》同時成書的抄稿本《貿易須知》，指出這部主要提供當時中小商人閱讀的商業書，其內容雖然帶有廣泛意義下的儒家道德色彩，但仍然表現出強烈的務實性格，故而明清商業書強調的「修身」還是和儒家「修身」觀念有所差異，不能等同視之。此點看法較近余英時。但陸冬遠同時指出：明清商業書討論的道德，其內容很少包括商業經營應該如何與整體社會結構相互作用的論述，而「更多的只是關心商人自己的營業利益」。<sup>69</sup> 這點可能又類似寺田隆信。

由學者對明清商業書的不同評價來看，《商賈便覽》有關「生財有道、仁義禮智信」等看來頗為符合儒家道德的關鍵詞句，到底應是要如寺田隆信主張之只能反映商人不能「勇往直前迫使士大夫階級承認商人階級獨立存在的價值」？或如陸冬遠所說之「更多的只是關心商人自己的營業利益」？還是像余英時判定之不能因為商人「依附了某些舊形式而忽視其中所含蘊的新創造」？以吳中孚為例，當他詮釋「大富由命，小富由人」以及「上質者，習

---

版公司，1994），頁 80。吳中孚的「小富由人」以及「中質者，學工商」等有關商業倫理的提法，筆者以為不僅體現了余英時所說的「賈道」，或許也能若干程度地回應黃進興在此處的設問。

67 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收入氏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訂版）》，頁 175-248，引見頁 203。

68 類似商人價值觀反過來改變士人觀點的提法，參見（加拿大）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駿、王秀麗、羅天佑等譯，《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第 4 章，特別見頁 355-358。

69 Richard John Lufrano,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184-185.

儒業；中質者，學工商」等觀念時，是否也正在塑造一套具有重要意義的商業倫理？而這套可以統括在「小富由人」觀念下的商業倫理，反映了當時社會何種變化？又對後來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因為史料有限以及比較視野差異，可能現在仍不好遽下定論。

商業倫理確是複雜課題，既涉及如何擴大考察傳統中國史料，也須講究如何妥切地鍛鍊對待中國、歐洲或其他地區商業倫理的比較視野。無論是寺田隆信主張明清商業書未曾出現「對產生和支持這種商業道德本身的社會體制的批判」、陸冬遠所說中國商業書「更多的只是關心商人自己的營業利益」，或是余英時指出明清商人意識形態在向市場以外領域擴張過程中「改變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會與文化」，這些論述雖有差異，但其實都難免拿中國與歐洲歷史上的商業與社會互動關係做比較，涉及問題實在非常複雜。

如何將商業倫理議題更完善地放入歷史比較的研究視野？除了涉及中國、歐洲與其他地區的具體時空因素，那些公開表達商業與道德互動關係的作者身分究係職業商人或是非職業商人？這個因素也極重要。作者身分的不同，也很可能影響商業倫理的論述方向。以十八世紀以後歐洲社會哲學與政治經濟學者有關商業倫理的著作為例，他們確實討論到不少有關「激情（passion）、德性（virtues）」與「理性、利益（interests）」之間可能存在的各種緊張或互補關係，但我們必須留意到：這些歐洲作者身分可能大都並非職業商人，他們撰寫商業倫理題材所關心的重點，其實是當時歐洲商業發展是否可能節制專制王權，或是商業發展如何可能促成「文明社會」發展等政治社會哲學問題。<sup>70</sup> 若將吳中孚和這些歐洲社會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家併肩而論，似乎不夠切題也不盡公平。

若先排除社會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乃至於明清士大夫對於商業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討論內容，<sup>71</sup> 專門比較職業商人自己的撰述，則中國與歐洲當然

---

70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9-113.

71 十六世紀以後有越來越多明清士大夫論辯「重商以利農」的概念，其中不少內容涉及糧食貿易與商人角色如何有利農民生計的政策主張，參見（日）岸本美緒，〈清代中期的經濟政策基論——以 18 世紀 40 年代的糧價問題為中心〉，收入氏著，劉迪瑞譯，胡連成審校，《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還是存在不少差異，但其差異卻可能不必然表現在明清商業書「只是關心商人自己的營業利益」，而歐洲商業書則更多關注諸如「節制專制王權」等公共議題。如十七世紀末英國已出現按期記錄歐洲貨幣匯率變動等訊息的商業報紙，<sup>72</sup> 而十八世紀德意志也曾出現強調要以「理性」（reason）分析不同商業知識的商業書，<sup>73</sup> 這些內容似乎都不見於十八世紀中國商人編寫的商業書。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要問：當吳中孚論證「君子俱宜精察而提防之」種種有關勤勉謹慎的經商事宜，並標舉「中質者，學工商」理念來鼓勵有志從事工商業的年輕子弟及其家長，進而提醒人們「行行出狀元」的既有說法確有道理，這些可以包括在「小富由人」這一核心觀念下的商業倫理，真的只能同樣斷定為「只是關心商人自己的營業利益」嗎？筆者對此頗為懷疑，相對而言，便比較贊成余英時的提法：十六世紀以後中國商人逐步發展了一個相對「自足」的世界，這個世界既「立足市場經濟」而又「不斷向其他領域擴張」；這種「商人的社會自覺」有其不同層次的影響，「改變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會與文化」。以《商賈便覽》承載的商業倫理為例證，筆者以為余英時有關「商人的社會自覺」之提法，對我們考察明清商業與社會互動關係的內在發展理路，可能還是極富啟發的思考方向。

## 六、結 論

本文探究《商賈便覽》反映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倫理，既將此書內容放入吳中孚在江西經商開店以及當時中國長程貿易發展的大背景做檢視，也以吳中孚強調的「小富由人」概念為主軸，論證吳中孚所欲傳達商業倫理的核心內容。簡言之，「小富由人」有如貫串《商賈便覽》全書的主軸，對於吳中

---

頁 263-294；林麗月，《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這些內容應該也可視為當時中國商業與社會互動關係的相關論述。

72 Natasha Glaisyer, *The Culture of Commerce in England, 1660-1720* (Suffolk and New York: The Boydell Press, 2006), pp. 143-183.

73 十八世紀德意志境內出現某些強調客觀與科學分析商業知識的商業書籍，參見 Daniel A. Rabuzzi, "Eighteenth-Century Commercial Mentalities as Reflected and Projected in Business Handbook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2(Winter 1995-1996): 169-189.

孚而言，它既可總結其有關謹慎、勤勉有利於商業成功的信念，也有助於導出「中質者，學工商」這種有關商業教育訓練的基本理念；因而，「小富由人」其實即構成了吳中孚在《商賈便覽》所欲傳達有關商業倫理的核心內容。

最後，還可對明清商業書的流傳途徑做些補充。對於明清中國眾多商人而言，學習商業知識以及體會商業倫理相關思想，可能多半仍是藉由「口傳心授」途徑；無論是《商賈便覽》這類刊印本商業書，或是《生意世事初階》的抄稿本商業書，都只能提供部分商人學習切磋或是藉以訓練學徒的一些「文字傳播」商業知識。我們確實不宜高估這些刊印本與抄稿本商業書的流通閱讀人數，<sup>74</sup>更廣大的商人仍是透過口傳心授習得商業知識。然而，《商賈便覽》做為十八世紀編撰的一部刊印本商業書，不僅試圖將吳中孚自己受到父兄師長口傳心授的商業知識寫入當時書籍市場上已然流傳的刊印本文字傳播商業知識，更有意識地將諸如選購與發賣貨品、從事商業談判、提防商途風險、

---

74 即使如此，在商人手抄而幾乎全不公開的一些文字紀錄裏，有些篇幅甚短但卻為商人私下摘錄的「零碎、片斷」商業書內容，同樣是流傳有關明清商業、道德與社會互動關係的重要文字載體，其影響也值得重視。如存世一批大約寫在 1890 年代的商人信稿，作者大概是一位出生於 1874 年左右的泉州商人金竹如，他在當時來往於寧波、淡水之間經營南北貨生意，在這批由後代研究者方豪命名為《尺素頻通》的書信稿中，即抄有一件取名〈陶朱公理財要圖〉以及一件取名〈名言雜抄〉的兩篇文字（兩件文書見林玉茹編，《尺素頻通：晚清寧波與泉州、臺灣之間的貿易文書》，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 213-216、217-219。有關金竹如生平及《尺素頻通》重要內容，則見林玉茹，〈導讀：寧波代理商與泉州、臺灣郊行之間的通信〉，收入林玉茹編，《尺素頻通：晚清寧波與泉州、臺灣之間的貿易文書》，頁 1-27），列出所謂「能識人、能用人、能整頓、能辦貨、能安業、能敏捷、能接納、能倡率、能知機、能辯論、能還賬、能討賬」以及「勿鄙陋、勿浮華、勿優柔、勿強辯、勿懶惰、勿固執、勿輕出懶收、勿貪賒畏還、勿痴貨善惡、勿昧貨時宜、勿貨賤怕蓄、勿貨貴爭趨」等可謂十二「能」、十二「勿」的條目，各條並繫以簡單解釋。還有做為近代中國百貨商業之父的馬應彪，他 1864 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11 歲入私塾讀書，19 歲遠赴澳洲當採錫礦工人，1894 年在澳洲雪梨受洗為基督徒，之後返回香港開設永昌泰金山莊，1900 年在香港開設先施公司，1910 年在廣州創先施百貨公司，1914 年於上海開先施百貨公司。像這樣的現代企業家，也在其個人手稿《家庭筆記——自序及歷年公職文詞錄》裏，留下諸如〈十窮十富格言〉以及題為〈陶朱公理財〉十六則等類似明清傳統商業書內容的手抄文件，後者內容也與前述〈陶朱公理財要圖〉頗為相近，見李志剛，〈基督徒與中國近代百貨業的開創與發展：以馬應彪創辦先施百貨公司為例〉，收入氏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人物》（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頁 23-25。

辨別白銀貨幣成色、布置店鋪門面、租用倉庫設施、寫作商業書信，以及訓練夥計與學徒等等問題，納入到「商賈便覽、算法便覽、銀譜便覽、尺牘便覽、路程便覽」等五大商業知識領域，從而構成了當時中國一套更加系統性的商業知識。同時，吳中孚留下的一些個人生平資料，也為我們審視十八世紀中國商人的日常生活，以及這些職業商人如何建構商業倫理等問題，開啓了一扇景象頗為可觀的窗戶。

十分感謝兩位審查人寶貴意見，給予筆者許多匡正。也謝謝范金民、張海英、王振忠幾位先生提供珍貴的商業書史料並給筆者啟發。寫作期間，蒙陳國棟、杜正勝、瀧野正二郎、陳正國、陳雯怡、李仁淵、和文凱等師友提供建議，一併誌謝。同時，也感謝陳佩歆小姐協助查核史料，以及步德茂（Thomas Buoye）教授改訂英文摘要。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元·不著撰人，《永樂大典戲文》〈小孫屠〉，收錄於「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2007.12.12 上網檢索。
- 明·不著撰人，《客商規鑒論》，收錄於明·三台館主人仰止余象斗編，《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據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余氏雙峰堂刻本影印），收於（日）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3卷第2冊，東京：汲古書院，1999，卷21「商旅門」，頁294-348。
- 明·程春宇，《士商類要》，書前有明天啟六年（1626）方一桂敘文，楊正泰點校本，收入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229-381。
- 明·李晉（留）德，《客商一覽醒迷》，書前有明崇禎八年（1635）〈合刻水陸路程序〉，新校本，收入楊正泰校注，《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267-329。
- 清·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階》，書前有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汪氏重抄本序言，現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 清·吳中孚，《商賈便覽》，「六集八卷」本，書前有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作者自序，影本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

- 清·不著撰人，《當舖集》，清抄本，書前封面署有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增補鈔本，影印收入《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秘籍》，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印，「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2001，頁 1-128。
- 清·任城李氏定本，清·峻山氏重輯，《論皮衣粗細毛法》，清抄本，書前題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城李氏定本，峻山氏重輯」，影印收入《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秘籍》，頁 129-168。
- 清·不著撰人，《當舖》，清抄本（未具撰抄年代），影印收入《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秘籍》，頁 169-350。
- 清·不著撰人，《成家寶書》，清抄本（未具撰抄年代），影印收入《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秘籍》，頁 351-495。
- 清·不著撰人，《定論珍珠價品寶石沅頭》，清抄本（未具撰抄年代），影印收入《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秘籍》，頁 497-545。
- 清·范銅，《布經》，清抄本，影印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3 輯第 3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82-110。
- 清·不著撰人，《布經要覽》，清汪裕芳鈔本，影印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0 輯第 1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581-599。
- 清·不著撰人，《布經》，清抄本，安徽省圖書館藏。
- 清·連柱等纂修，乾隆《廣信府志》，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919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金竹如，〈陶朱公理財要圖〉、〈名言雜抄〉，收入林玉茹編，《尺素頻通：晚清寧波與泉州、臺灣之間的貿易文書》，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 213-216、217-219。

## 二、近人論著

- （加拿大）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駿、王秀麗、羅天佑等譯 2004 《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方志遠 2001 《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振忠 2007 〈漂廣東：徽州茶商的貿易史〉，收入氏著，《千山夕陽：明清社會與文化十題》，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頁 103-143。
- （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道豐、孫耀、閻守誠等譯 1986 《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余英時 2004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吳承明 1985 《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志剛 2006 〈基督徒與中國近代百貨業的開創與發展：以馬應彪創辦先施百貨公

- 司為例》，收入氏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人物》，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頁 13-30。
- (日) 岸本美緒 2010 〈清代中期的經濟政策基論——以 18 世紀 40 年代的糧價問題為中心〉，收入氏著，劉迪瑞譯，胡連成審校，《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63-294。
- 林玉茹 2013 〈導讀：寧波代理商與泉州、臺灣郊行之間的通信〉，收入林玉茹編，《尺素頻通：晚清寧波與泉州、臺灣之間的貿易文書》，臺北：政大出版社，頁 1-27。
- 林麗月 2014 《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邱澎生 1995 〈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臺大文史哲學報》43(1995.12): 37-92。
- 邱澎生 2009 〈國法與幫規：清代前期重慶城的船運糾紛解決機制〉，收入邱澎生、陳熙遠合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275-344。
- 范金民 2007 《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訴訟》，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康 樂 2007 〈說明〉，收入韋伯 (Max Weber) 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遠流出版公司，頁 1-2。
- 張海英 2002 《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張海英 2005 〈明清社會變遷與商人意識形態——以明清商書為中心〉，《復旦史學集刊》第 1 輯《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145-165。
- 張海英 2007 〈從明清商書看商業知識的傳授〉，《浙江學刊》2007.2(2007.3): 83-90。
- 曹樹基 1985 〈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4: 19-40。
- 許 檀 1998 〈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3(1998.9): 106-120。
- 陳支平 1983 〈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3(1983.4): 116-120。
- 陳亞平 2014 《尋求規則與秩序：18-19 世紀重慶商人組織的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 陳國棟 1982 〈懋遷化居——商人與商業活動〉，收入劉岱總主編，劉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論：經濟篇——民生的開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243-284。
- 陳國棟 2005 《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 陳學文 1997 《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公司。

- 黃志繁、廖聲豐 2005 《清代贛南商品經濟研究：山區經濟典型個案》，北京：學苑出版社。
- 黃進興 1987 〈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迷思或事實？〉，收入氏著（1994），《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頁 77-84。
- 劉石吉 1989 〈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收入《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論文集》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頁 177-232。
- 蕭放 1987 〈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的發展及其歷史局限〉，收入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經濟史研究室編，《江西經濟史論叢》第 1 輯，頁 139-175。
- 錢新祖 2013 〈近代人談近代化的時空性〉，收入氏著，《思想與文化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頁 3-15。
- 戴史翠（Maura Dykstra） 2013 〈帝國、知縣、商人以及聯繫彼此的紐帶：清代重慶的商業訴訟〉，收入王希主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重慶：重慶史研究論文選編》，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頁 166-180。
- 鞠清遠 1977 〈清開關前後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 2 輯第 3 冊，臺北：正中書局，頁 205-244。
- 魏金玉 1991 〈介紹一商業書抄本〉，《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1 (1991.2): 43-51。
- 顧忠華 1998 〈儒家文化與經濟倫理〉，收入劉小楓、林立偉編，《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45-66。
- 顧忠華 2005 《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Abend, Gabriel. 2014. *The Moral Background: An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laisyer, Natasha. 2006. *The Culture of Commerce in England, 1660-1720*. Suffolk and New York: The Boydell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9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edition.
- Lufrano, Richard John. 1997.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Rabuzzi, Daniel A. 1995-1996. "Eighteenth-Century Commercial Mentalities as Reflected and Projected in Business Handbook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2(Winter 1995-1996): 169-189.

## **A Consider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Business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ief Guide for Traders and Shopkeepers***

Chiu Pengsheng\*

### **Abstract**

In the wake of the expansion of long-distance trade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a variety of “commercial guidebooks” with content relating to communications, accommodations, currency, weights and measures, commodities, commercial taxe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began to appear. These commercial guidebooks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entire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works are especially valu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knowledge, attitudes, beliefs, as well as for critiqu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mong merchants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takes Wu Zhongfu’s 吳中孚 *Brief Guide for Traders and Shopkeepers* 商賈便覽 as its principal historical material to undertak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business ethics.

Wu’s guidebook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commercial economy in Jiangxi 江西 province and the major arteries of long-distance trade at that time. Wu’s key emphasis on the idea that “one may get minor benefit from his own industriousness 小富由人,” which he uses not only to elaborat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aution and prudence for a successful business, but also to delve into the idea that “children of average ability are

---

\* Chiu Pengshe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est suited for study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中質者，學工商，” elucidates Wu’s understanding of commercial training. Thus, I argue that “one may get minor benefit from his own industriousness” is a doctrine that exactly constitutes the kernel of business ethics in Wu’s commercial guidebook. Finally I hope to shed light on the issue of how the changing content of business eth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s interwov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erce and society.

**Keywords:** Wu Zhongfu 吳中孚, *Brief Guide for Traders and Shopkeepers*, commercial guidebooks, business ethics, Ming-Qing China